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XIANQIN LIANGHAN WENTI YANJIU

先秦两汉文体研究

于雪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XIANQIN LIANGHAN WENTI YANJIU

先秦两汉文体研究

于雪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先秦两汉文体研究 / 于雪棠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303-14098-5

I. ①先… II. ①于… III. ①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文体论—研究—先秦时代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文体论—研究—汉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46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7

字数: 151 千字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张 翌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序

所谓文体，指文学体裁、体制或样式。中国古代的文体纷繁复杂，美不胜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珍贵宝藏，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份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去发掘，更值得我们去继承。

我对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兴趣，始于1999年初夏，申报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论》。当时我注意到，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研究一直十分关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体研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构成进行总体研究，却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的学术课题。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体研究成果的总结，更是对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深层发掘。而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研究，将有利于深入把握中国古代文艺学思想的精髓，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宝藏。该项目于2000年获得批准立项，从此我就同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研究中国古代文体，不仅应当关注文体理论，更应当关注文体实践。就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而言，更丰富的宝藏、更珍贵的财富，还不是条分缕析的文体理论成果，而是匠心独运的文体实践结晶。探究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独具一格的文体实践，更能使我们走进每一位作家的心灵，更能究索每一部文本的内蕴，更能揭橥每一种文体的奥秘，也更能观赏中国历代文化变迁的图景。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2000年盛夏,当于雪棠博士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站工作时,我就建议她选择先秦两汉文体作为研究课题。雪棠从小沐浴书香门第的熏风,家学渊源深厚,国学功底扎实,兰心蕙质,勤勉好学。更难得的是,禀承乃父海洲先生庭训,雪棠接受了中国古代文体写作的系统训练,诗词文赋,多有佳作,在同龄人中堪称佼佼者。研究古代文体而不懂得文体写作,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说出来的话只能是隔靴搔痒。因此,雪棠可谓古代文体研究的最佳人选,我当时就坚信,她一定能在文体研究方面独辟蹊径,自树一帜。

在博士后站工作的两年时间里,雪棠浸淫经典,沉潜学问,在对具体文本的深入解读中,一方面细致入微地探究文体的内在构成方式,一方面上下求索地考察文体的生成演变过程以及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2002年6月博士后出站时,雪棠呈交了一份题为“先秦两汉文体研究”的工作报告,涉及以下七个论题:《周易》与上古文学占筮型问对体,《周易》经传结构与战国秦汉散文的体制,《尚书》的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从《尚书·尧典》等篇看早期历史叙事文体的特征,从秦汉封禅文看文体与文化生态的关系,《尚书》训体与《史》《汉》书志及《七发》、刘向《说苑》等书编撰体例考源,从东汉碑文看文体的分合交叉及其他。

从这些论题的标目即可看出,雪棠的学术研究具有非常鲜明的三大特色:第一,擘肌分理地细致解析具体文本,以此作为文体研究的坚实依据,摒弃蹈空之论;第二,密切关注文体的复杂构成,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文本与文本、文体与文体之间的渗透、交叉、融合等关系,避免偏执之见;第三,深入追索促使文体生成及嬗变的主客观因素,在错综丰富的文化语境中揭示文体的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这三大特色,得到出席博士后出站报告评审会专家的一致称赏,并从此奠定了雪棠学

术研究的坚实基础。

雪棠在 2002 年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以后，虽然工作繁忙、家事冗杂，但却仍然孜孜矻矻、潜心学问，在学术研究园地里精心劳作、勤奋耕耘。她一边修订旧稿，一边撰著新论，对春秋辞令、《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西汉诏策等论题，又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大大充实了博士后出站报告。

2009 年，这部面貌一新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有幸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来年即将问世。我私心以为，在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体的论著中，这部著作犹如临风玉树，秀美多姿。所以当雪棠请我作序时，即聊书数语。是为序。

郭英德

2011 年 9 月 2 日

前 言

古人对文体很早就有了朦胧的认识。把诗编为三百篇总集的《诗经》、把历史上的官方文告记录下来的《尚书》，就体现出以类相从的编辑原则，表明人们对于诗歌与散文这两种不同文体的特点已经有了区分意识。时至两汉，《汉书·艺文志》具有不容忽视的文体分类价值。魏晋时期，人们的文体观念十分自觉，产生了在文体研究史上举足轻重的单篇论文与专著，如《典论·论文》《文赋》《文选》及《文心雕龙》等。其后，对于文体的研究绵绵不绝。比较著名的专著有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等。

进入近现代以来，一些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著作，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都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文体变迁有所涉及。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姜亮夫的《文学概论讲述》设专章讲述文体，顾易生、蒋凡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也涉及文体问题。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梳理了古代众多文体，对每一种文体的源流、体制论述详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系列古代文体理论方面的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文体学丛书。对于文体的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大多集中在诗、赋和小说上。至于古代散文文体，则明显有些冷落。对于先秦两汉这一时期的文体现象，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仍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这个课题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也是我国古代众多文体开始萌芽乃至成熟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多

种文体，大的类别有诗歌与散文的分别，下一个层次的区分则体类更多。而且，具有诗与文两种文体特征的赋，也兴盛于这一时期。从刘勰开始，就多有学者将众多文体都溯源于五经。北齐颜之推、清代的章学诚，都表述过类似的看法。如章学诚曾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这些看法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大体符合实情。因此，深入地梳理、研究先秦两汉这一时期的文体现象以及人们的文体观念，具有追本溯源的启示意义。

文体研究是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古代文学的文学种类和样式非常丰富，每一时代都有其特别发达的一种文体。文体的变迁，包含着文学观念的变迁；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往往表现为对文体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对于不同文体体制特征的辨析和分类，一种文体的发生及发展演变过程，以及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等问题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能够推动、促进我们对于文学创作规律的掌握。而梳理与探讨具有奠基意义的先秦两汉时期文体与文体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会帮助我们澄清文学史研究中一些历来面目模糊的问题。

文体分类、文体源流及体制，是文体研究的基本问题，大多数文体研究著作对此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做出了多种解答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不过，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或者值得重新认识的题目。

本书主要以先秦两汉时期《周易》《尚书》两部经典本身及相关散文文体现象及文体观念为研究范围，意图从大的文化背景纵向观照某些文体的产生和发展，横向考察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深入追索促使文体产生及嬗变的复杂因素，包括时代风尚、文艺思潮、学术氛围、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与审

美偏好、题材内容及读者对文体的心理期待等。希望能够有所发现，有所收获，对这一课题有所贡献。

本书以先秦两汉文体现象及文体观念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十个论题，着重于探源和考变。主要结论如下：

1. 《周易》本经对卦式结构、包举宇宙式的结构、经传合编的结构编排体例与战国秦汉时期散文著述的体制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2. 《尚书》篇名的命名方式暗中制约、规定着人们进行文体分类。六体之名是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行为本身的特点与记录行为的文本体类特点具有一致性。

3. 从叙事与记言角度考察，《尚书》中《尧典》《禹贡》《金縢》和《顾命》四篇属叙事体，相对于其他篇章更多地具有说（口语）的色彩，这几篇鲜明地表现出写（书面）的特征。

4. 《尚书》典体文有两条发展线索，其一为封禅文。封禅文本的产生及外在形态受到文化生态的影响。作者对文本功能期待的变化体现出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

5. 《尚书》中的训含有解说、传授知识的含义，训体文是《史记》和《汉书》书志的先声，训体文经历了由说明文到议论文的转变。

6. 春秋辞令的卓绝丰富，与当时重言尚辞、崇文重礼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春秋时期还存在一种“辞其何益”的看法。受重辞与轻辞两种看法影响的辞令，其风格存在很大差异。

7. 《春秋》经的两部公羊派早期阐释著作《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前十七篇），文体迥异。文体的生成与经学阐释方式直接相关。《公羊传》与《春秋繁露》不同的文体，反映出先秦与汉初两种不同的经学阐释方式。

8. 西汉诏策多为帝王自拟，汉帝的从师问学情况，除高祖和文帝，其余史有详载。经学教育是一种观念教育，在灾异诏的内容和体制中有明显的表现。经学教育培育出不同的人格类型；不同人格类型的帝王，其诏策风格亦不相同。

9. 刘向编辑的《说苑》《新序》和《列女传》三部书的体例，缘于先秦诸子及战国至汉初的说经方式，其意在事先、以事言理的思想表达方式与《周易》一脉相承。

10. 碑文兴起于东汉，以颂德为主，碑与铭诔存在渗透交叉、分分合合的关系，文体的产生与兴盛具有偶然性。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周易》经传结构与战国秦汉散文的体制	1
第一节	对卦式结构形态	2
第二节	包举宇宙式结构	8
第三节	序在书末的体例	13
第四节	经传合编与论说文	18
第二章	《尚书》的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	23
第一节	前人的分类	23
第二节	篇章命名方式与文体分类	26
第三节	六体名义辨析及篇章归属	28
第四节	名与体例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	38
第三章	从《尚书·尧典》诸篇看早期历史叙事文体的特征	46
第一节	叙事与记言	46
第二节	结构体制	49
第三节	语言风格	55
第四章	《尚书》典体文与秦汉封禅文	61
第一节	典体文发展的两条线索	61
第二节	封禅文的文体特征与文化生态	64
第三节	本典与仿制：经典的形成及文学观念的变化	77
第五章	《尚书》训体与《史》《汉》书志及《七发》	83
第一节	训的内涵及体类特征	83
第二节	训与《史》《汉》书志体	94
第三节	训与谏诫文及《七发》	102

第六章	文学观念与文体的生成——以春秋辞令为例	109
第一节	引“言”与“立言”：重“言”观念	109
第二节	“辞不可以已”与“辞其何益”：两种相反的言辞观	114
第三节	以“文”论辞令：对辞令文学性的重视	119
第四节	“择言以教”与“能辞为宝”：言辞能力的培养	122
第七章	经学阐释与文体的生成——以《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为例	126
第一节	“辩而裁”与“博而切”：两种相异的阐释文体	126
第二节	“依经以辨理”与“合经以立义”：先秦与汉初两种经学阐释方式	131
第三节	“义由例出”与“体由义出”：阐释法引出观念与观念生成阐释法	137
第八章	经学师受与文体的生成——以西汉诏策为例	140
第一节	帝王之师及其所受之学	140
第二节	经学师受与帝王人格类型	151
第三节	诏策的内容、体制与帝王的经学师受	154
第四节	诏策的风格与帝王的经学师受	163
第九章	文体的多源性——以《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为例	175
第一节	三书体例与先秦诸子	175
第二节	三书体例与说经方式	179
第三节	以事言理的思想表达方式考源	183
第十章	文体的分合交叉——以蔡邕碑文为例	188
第一节	碑文的兴起及体制特征	188
第二节	碑文与铭诔的分合交叉	192
第三节	蔡邕的修史情结与其碑文创作	196
主要参考书目		201
后 记		210

第一章

《周易》经传结构与战国秦汉 散文的体制

《周易》本经具有对卦式和沟通天人的编排特点，把本经与七种《易》传联结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传具有后世序的文体特征。本章拟从对卦式、沟通天人、序的体例及经传合编与论说文的形态这四个方面，考察《周易》经传与战国秦汉散文几种结构编排形式之间的关系，力求以《周易》经传的结构为线索，揭示上古文学作品某些结构特点及其源头所在。

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成书年代与编排体例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在进行研究之前，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赞成这种看法：《周易》本经的撰定及编次成于西周初期，《易》传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非一人所作，把经文与传文合编

在一起，始于西汉的费直。^① 这是本章所有结论的前提。

第一节 对卦式结构形态

六十四卦是按照两两相对的方式编排的，每两卦为一组，

① 关于《周易》经传作者、著作年代及编排体例，撮举几种观点，排比如下：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班固：《汉书》，第62卷，27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第47卷，19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汉书》，第30卷，1704页)

皮锡瑞有“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文。(详见(清)皮锡瑞：《经学通论》，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李镜池：《彖传》与《象传》，“年代当在秦汉间；其著作者当是齐鲁间底儒家者流。”《系辞》与《文言》，“年代当在史迁之后，昭宣之前。”《说卦》《序卦》与《杂卦》“在昭宣后。”(李镜池：《易传探源》，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94~1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高亨：“说十翼中有汉人作品，并无坚确的论据。管见以为十翼都写于战国时代，正如欧阳所说‘非一人之言’，《彖》《象》比较早些，可能在春秋末期。”(高亨：《周易杂论》，35~36页，济南，齐鲁书社，1979)

黄寿祺、张善文：“《易传》七种原皆单行，后来被合入经文并行……关于援传连经始于何人的问题，旧有两说。……(三国)淳于俊认为，东汉的郑玄合《彖传》、《象传》于经文。《崇文总目》云：‘凡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曰：‘凡以《彖》、《象》、《文言》等参入卦中，皆祖费氏。东京荀、刘、马、郑皆传其学。王弼最后出，或用郑说，则弼亦本费氏也。’……汉代学者出于便利诵习的目的，编成经传参合本，当是较为可信的说法。”(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可以分为三十二对。这种编排的本子出现甚早，流传久远，影响很大。本经具有这个特点，《易》传对此又做了明确的阐释。《杂卦》作者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易》经对卦式这一重要的编排方式，其阐发深得要义。《杂卦》没有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解说卦义，而是错综交互地叙述，错杂之中有一个规律，即大体上是把相邻的两卦联系起来对卦义进行说明。^①

究其渊源，如此编排，与《易》经的中心观念——阴阳不无关系。《易》卦象的基本符号是阴爻和阳爻，其中蕴涵朴素的对立转化观念，也蕴涵二分法的世界观。由此而来，全书六十四卦按照两两相对的原则来编排，自然顺理成章。

那么，对举的两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或者说，遵循什么宗旨来选择对排的两卦？晋韩康伯在注中指出：“《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②“以同相类”和“以异相明”，正是《易》经六十四卦一个基本的编排宗旨，在这个宗旨的支配下，才形成两两对举的编排形式。

以同相类和以异相明二者相较，以异相明占大多数。例如《杂卦》云：“《乾》刚《坤》柔，《比》乐《师》忧。”“《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③乾道刚健，坤道柔顺。《比》卦旨在结群，故乐；《师》卦言军旅之事，故忧。《震》卦讲

① 《杂卦》自《大过》以下八卦，没有两两相对地加以解说，对此，古人虞翻、干宝、朱熹等都提出各自的看法，或解释原因，或疑为错简。近人尚秉和认为这几卦“虽不对举，而义仍反对”。（尚秉和：《周易尚氏学》，3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② （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本章所引《周易》经传原文均出自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

③ 本段所引《杂卦》均出自《周易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96页。

的是雷动之象，在古人观念中，雷动为万物起始初动之象，《说卦》认为“万物出乎震”^①，故曰起；《艮》象为山，山为静止不动之象，故曰止。《损》为盛之始，《益》为衰之始。《睽》卦所言都是离家在外之事，《家人》卦讲的是治家之事。《否》为天地闭塞之象，《泰》为天地交通之象，二者卦象与性质恰恰相反。其他还有许多，不一而足。

《杂卦》所言属于“以同相类”的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②《革》卦义是革去已有的；《鼎》卦义是煮熟生食后取得新食，意在取得新物。两卦意相连属。“不进”与“不亲”都是否定性的行为和情感，故为同类。再如《临》与《观》二卦，具有动作的连续性，先临近，后观察。《萃》与《升》二卦也具有动作的连续性，先聚集，后上升。这两组也都属于以同相类型。

《易》经的这种对卦式结构方式及其遵循的宗旨，给后代著作的结构编排颇多启示。《吕氏春秋》中依照“以异相明”或“以同相类”方法编排结构的篇目所在多有，仅举几例，略作说明。《贵公》和《去私》，《劝学》和《尊师》，《侈乐》和《适音》，《不二》和《执一》等紧紧相邻的几篇都是对卦式结构。仅从题目上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贵公》以公正为贵，《去私》则是去除私心，二者正是相辅相成。贵公必须去私，去私才能贵公，它们互为前提和条件，相互发明。《劝学》旨在劝勉人们要致力于学习，学习自然离不开老师，对待老师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尊师》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强调了尊师重教的重要性。《侈乐》批评了奢华靡费的音乐，是从反面论述；《适音》篇就从正面论述了音乐应当平和适中的道理。《不二》即不能有两个中心，强调权力集中统一，通过否定“二”来说明应该“一”的治国之道；

① 《周易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94页。

② 《周易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96页。

《执一》也同样是强调要集权力于一身，直接用肯定形式来表达政治观点。一否定一肯定，突出了作者对君主权力分配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吕氏春秋》的篇目编排虽然存在大量的《易》式对卦型结构，但还属于局部现象，并不是整部书都如此。时至汉代，作者和编撰者更加有意识地注重书的整体结构编排，出现了不少精心编排结构的著作，《说苑》就是一部值得玩味的书。

刘向整理编定了多部散佚的古籍，他编撰的书，基本上都有一个整饬的总体结构。《说苑》一书全部都是按照两两相对的原则来编排顺序的，或“以异相明”或“以同相类”。全书分为二十卷，依次是：《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①

从卷目上看，《君道》与《臣术》，《建本》与《立节》，《修文》与《反质》六篇“以异相明”的特点非常明显。《君道》论述的主题是君主治国治民的原则、方法以及个人应具有的操守和德行等；《臣术》对人臣应遵循的原则、具备的才能及应坚持的操守等展开论述。君臣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相对立，又相依赖。君道与臣术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发明。《建本》讲的是建立根本，主要说明立身处世、为政治国应首先做好的根本大事。“本”与“节”本来是相对而言的。《立节》讲的是树立名节，把《建本》中的主张具体化了，并对《建本》的内容作了一些补充，侧重臣民一方立论。《修文》主旨是兴修文教，制礼作乐，“文”是修饰，是加在事物本来天性之外的东西；与“文”相对的则是“质”，相连的一卷就论说“反质”，使事物回归本质，保持它质朴的本性，主要内容是反对

^①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